

一九七〇年代故宮寫真

陳葆真

三十多年前的諸多往事漫無頭緒，卻鮮明如昔，令人印象深刻，歷久難忘；而今有些當日的師友或已別世，或已退休，更令人感念。

如今提筆所記，雖不過糟粕，但畢竟是舊日情景。

它不但是自己人生當中一段青春歲月，也是當時一些同事們共同的記憶，同時更是故宮在七〇年代的一方寫照。

故宮「換新裝」了。

就像昆蟲蛻殼一般，故宮每一次蛻殼便增長一圈。事實上，故宮在過去四十年當中，不論在內部空間的使用上，或外部周邊的建設上，都經過了幾度明顯的改變。我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共七年的時間，在故宮學習與工作，因此，較熟悉的是早期故宮的形貌。面對眼前變化巨大的故宮景觀，我有點惆悵；懷舊之情脈脈，思緒盪漾，眼前浮現的是一九六七年暮春第一次參觀故宮特展「清宮珍寶與奏摺」的印象，以及其後多年在那兒學習與工作的生活點滴。



圖一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造」磁磚

一、
 原來的故宮及周邊外貌簡單、大方：宮殿式建築、黃褐兩色磁磚牆面（磚上紀年：「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圖一}），屋頂覆蓋綠色琉璃瓦，一層層仿漢白玉護欄，氣象莊嚴（^{圖二}）。它的主體建築深藏在兩山之間，背靠著岩質大山，厚實穩當。主體左側以一道溪澗隔開了左鄰的衛理女中。左前方則為一片開闊青翠的溪谷草地。主體的右側是一層層梯田，水流淙淙，綠意盎然。右前方是一座種滿相思樹的小山，鬱鬱蔥蔥。前有照、後有靠、左青龍、右白虎，地理上乘。當初

高人擇地興建，以貯國寶。參觀者除了乘轎車或遊覽車從山腳左側沿著兩邊種植龍柏的環山單行道出入之外，多半遊客都從山腳下的階梯開始，面向主建築拾級而上，穿過牌樓，沿著廣場，向前邁進：遠可仰視距離之外的主建築，近可瀏覽兩側的華表和園藝設計，以及植物苗圃。走到廣場盡處，再爬升三折「之」字形寬闊的階梯之後，便到達了高臺上的館前小廣場。訪客可以在那兒購票，進入一樓大廳，再上二樓展覽室參觀，或是登上廣場上的另一個平臺，從那裡購票，直接進入二樓展覽室，開始觀覽。那時的一樓是行政區，包括大廳、院長室、大演講廳、各處辦公室、庫房、科技室（一九七五年故宮後院坊方後移到小山上現址）、照相室、展覽組工作區、衣帽間、購物中心和郵局等等。展覽室都在二樓、三樓和四樓正廳。四樓另有東、西兩閣樓，空間狹小，是喝茶、喝咖啡、和吃小點心的休息處。

據文獻處的林信美女士說，一九六五年故宮剛復院時，工作人員只有六〇〇~七〇〇人（現約有六〇〇人），包括資深的老故宮（他們從大陸護運文物來台）、台中霧峰北溝時期入宮的工作人員，以及在外雙溪復院後新進的人員。除少數人員居住在故宮附近的宿舍外，多數人都搭乘交通車上下班。那時從市中心到故宮只有「大南二路」（現255前身）和「中興巴士」（現304前身）二種，且發車間隔都在半小時以上；晚間車班更少，因此來往故宮十分不便。雖然如此，當時由於大陸鐵幕深垂，因此臺灣便成為中國文化的櫥窗；嚮往中國文物的外國學者和觀光客都慕名來訪故宮，故宮是當時臺灣觀光最主要的重點之一。一輛輛遊覽車和當時算是稀奇的私家小轎車首尾相接，特別是在十月國慶期間，故宮展覽廳內幾乎擠得水洩不通。而國內遊客也絡繹不絕。但由於交通不便，要到故宮參觀，都引為大事，需要仔細規

劃：既要算準乘車時間，又要自備食物。因為當時院內並無餐廳，雖然東、西兩閣樓供應簡單的飲料和小點心，但卻無法填飽肚子。何況每間閣樓空間狹小，一位難求，因此無法滿足多數人的需要。所以要用正餐的人只能到故宮對面山腳下，那兒有兩、三間賣簡單麵食的小飯館。此外別無選擇。

能到故宮上課，是我們的幸運。一九七一年故宮蔣復璁院長（二八九九～一九九〇）和台大歷史系主任陳捷先教授代表兩個單位合作，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成立「中國藝術史組」，招收五名國內研究生，包括郭繼生、宋后楣、陳芳妹、陳擎光（一九四九～一九九五）、和我，以及兩名外籍生：分別來自美國的羅傑德（Roger Norther）和挪威的史美任（現為瑞典遠東博物館主任）。蔣院長對我們十分照顧，除了聘請故宮各領域的專家，包括李霖燦（一九一三～一九九九）、那志良（一九〇八～一九

九八）、譚旦厝（一九〇七～一九九九）、吳玉璋（一九〇五～一九八八）、和江兆申（一九二五～一九九七）等五位先生為我們講授中國器物 and 書畫鑑賞外，又送我們每人一部《故宮書畫

錄》。而且，頭兩年還向美國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申請，補助我們一些生活費和購書所需。第三年，並安排我們在故宮某些單位工讀，並撰寫畢業論文。這樣的學程設計，不僅使故宮專家可以將專業知識傳遞給後學，而且也促進了大學與博物館的合作關係，使學生得以兼具實務經驗與學理知識。這在以美術史為專業的培育訓練上是不可或缺的。蔣復璁院長和陳捷先教授當初合力策劃所成立的台大藝術史組，在十八年後（一九八九年）正式獨立為今天的台大藝術史研究所。他們當日的高瞻遠矚，助使臺灣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及早起步，並與國際接軌；對臺灣藝術史研究的奠基工作貢獻良多，功不可沒。特別是他們當初著力

要加強博物館合與大學之間的合作，以提升學術性的努力，日後也得到實踐。許多台大藝術史組（所）的畢業生曾先後到故宮服務。（圖三）

一九七三年，我已是碩士班三年級的學生，夏天時與陳擎光被分配到盜器股做暑期工讀。盜器股屬器物處，當時的股長為童依華女士，組員有鄭家璉、蔡本雄和趙大姐等人。我與陳擎光的工作是撰寫陶磁發展史的展覽解說。秋天後，我便和陳芳妹一同到登記組實習。當時的登記組主任為索子明先生，以下設登記室和資料室。她在登記室，我在資料室。登記室組長是唐恒亮先生，組員有劉守貞、胡木蘭兩位女士，和傅樂治先生。資料室組長是宋宇女士，組員為牟妮妮女士。索先生是研究漆器的專家，曾著《中國漆工藝研究論集》（二九七七）及其他多種專書。他是位慈祥的長者，身材修長，舉止文雅，明亮的大眼與淡淡的微笑，溫文內斂，反映了他明睿的

圖三 台灣大學歷史所中國藝術史組同學在陳擎光家中聚會
一九七六。
前排左起：石守謙、柏莉莎、唐內希普、顏娟英、朱惠良、蔡汝芬、葛婉章……
後排左起：王耀庭、陳葆真……
：陳擎光



洞察力與包容的處世態度，神情有些像南宋人所畫的禪宗大師〈無準師〉。

那時蔣院長爲了增進青少年與博物館之間的互動，特別開闢了一間「青少年博物館展覽室」。第一個特展特別請索先生主持，主題是「中華民族對西北

的開發與文化的傳播」。索先生便把它交由陳芳妹和我兩人負責。這是一個艱難的題目，因爲沒有實物，如何展覽？幸好我們兩人都在碩一時修過莊申教授（一九三二～二〇〇〇）所開的

「中國美術考古學史」，而我那時正著迷於佛教藝術，特別是敦煌石窟的壁畫和彩塑，所以對西北的歷史與考古有些概念。因此決定由我負責挑選展覽材料和撰寫文稿，而由陳芳妹負責向台大圖書館借出一些圖冊，交由故宮攝影室林傑人先生拍攝放大後展出。此外並由展覽組蕭子權先生（一九四七～一九九九）設計一個敦煌石窟和壁畫的模型。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拼湊出來的展覽，其整體效果令蔣院長相當滿意。我也順利交了差。多年以後，我在美國碰到正在那兒訪問的台大歷史系主任徐泓學長，他在無意間還以肯定的語氣提到當年的那個展覽（他並不知道那是我們負責的），我聽了心中十分高興，覺得努力沒有白費，而成

果能對人有用，則是工作的意義所在。就現在各博物館都在努力設法吸引青年人接近文物的趨勢而言，故宮早在三十年前已經開了風氣之先。

二、

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們幾個同學從台大碩士班畢業。郭繼生早一年畢業後，在軍中服役（後來去美國，現在馬利蘭大學執教）；宋后楣到美國深造（現爲辛辛那提美術館東方部主任）。蔣院長對我們剩下的三人作了安排：陳芳妹到圖書室（一年後赴英；回來後到銅器股；現在台大任教）、陳擎光到瓷器股，我則留在資料室。我們都從最基層做起。由於沒有職缺，所以我們雖然都有碩士學位，但也只能當最低階的職員：她們兩位是大學畢業等級的「助理幹事」，而我更慘，只是個高中畢業等級的「雇員」（一年後才升爲「助理幹事」）。然而我當時的確一點不在意，只是老朋友故意調侃，戲稱

我「陳雇員」！

在資料室的工作是很愉快的。那時資料室組長宋宇女士出國考察，因此只剩下牟妮妮與我，還有每週三下午才來一次的孫萬福（Ronald Dickson）先生。牟與我共同負責院藏作品的圖版管理、和海外收藏藝術品的圖片和幻燈片建檔工作。孫先生則幫忙英譯作品名稱。牟是端莊



圖四 牟妮妮女士與蕭璿先生結婚（一九七五），故宮同仁同往聖家堂參加婚禮後合影。左起：楊德芳……羅曼莉、孫萬福（坐輪椅）、蕭璿、牟妮妮、蘇篤仁、張友華、陳葆真、周功鑫、凌公山

淑女，處世理性平和；孫先生為人溫文幽默，我們三人相處十分融洽（圖四）。由於我的工作輕鬆，因可以利用空檔時從院裡的圖書室中借出一些英文寫的中國和日本的美術史書籍，一面加強英文閱讀能力，一面擴充知識。故宮圖書室隸屬於圖書文獻處，那時的處長是昌彼得先生。台大歷史系畢業的洪安全、劉家駒、莊吉發、吳哲夫、和張葳等學長都在那兒工作。

文獻處收藏從大陸運來臺灣的一些重要清宮檔案、文淵閣四庫全書、及許多善本書籍等等，對外並不開放，要經特別申請才能閱覽。當時圖書室主任是蘇篤仁先生。蘇先生學識淵博，精通英、日語，一九六七年從美返台，負責故宮圖書室的籌建。同時在圖書室工作的同仁還有王景鴻、凌公山、陳玉英、陳啓福、和周玉鸞等人。那時圖書室的中、英、日文藏書雖然不多，但在當年資訊極為匱乏的時代，卻可稱是全臺灣最好的藝術專業圖

書館。此外，還有特藏室，專收大陸出版的藝術類期刊，主要是《文物》和《考古》，但期數不全。如要閱讀得經特別申請，而且，限時、限地、限量，當天必還，否則追查到底。我有一次稍微逾時未還，便讓負責人吳哲夫先生急得打電話來申斥了我半天，可知問題有多嚴重。因為在那個年代這可是一件大事。那時讀書，特別是原版洋文書，都被視為珍品，而大陸書刊則被列為「禁書」，一般人是不能閱讀的。

一九七五年，在美國堪薩斯大學研究一年的余城先生回到故宮，調任到登記組，接續索先生的主任之職。同年圖書室主任蘇先生也調到我們資料室來。蘇先生出身嘉義詩書名門。他的祖父蘇孝德（櫻村）老先生為地方鄉紳，擅於詩文書法，並曾在日治時期代理過嘉義廳廳長，也是藝術贊助者，曾教過當時的青年畫家林玉山（英貴，一九〇七—二〇〇四）先生中國古文。蘇先生本身是臺灣大學外文系第二屆的

畢業生，一九五五年赴美留學，在當時可說是極為少數的幸運兒，一九六七年回到臺灣後，先在故宮書畫處，後來負責規劃圖書室，並擔任主任。他的學問淵博，精通日文和英文。當時最流行、人手一冊的《簡明英漢字典》

（台北：大陸書店，一九七三）便是他和吳炳鐘及陳本立等三人共同由日文版翻譯成中文的。蘇先生是正人君子，不修邊幅，凡事講求原則，個性耿介，不事逢迎；但對於向他求教的人，只要態度誠懇，他多半肯予指導。這時他既調到資料室，我便也趁機請他教我英文和日文。那時與我同時從蘇先生學日文的還有文獻處的洪安全先生。我們個別利用蘇先生工作的空檔；洪先生在週二下午快下班前的半小時左右，譯讀白川靜的《甲骨文的世界》；我則利用零碎的時間請教他。在蘇先生的指導下，我翻譯過青木正兒的〈關於何紹基的書法〉一文。當時只因興趣，所以譯完後也未出版。後來想譯《書道全集》中

的宋代書法部分，但因那時大陸書店已請人著手翻譯，所以我的譯書計畫也就作罷。上英文課多半是利用午飯的時候，教材主要採用蘇先生在東吳大學兼課所自編的《英詩選集》，以及一些課外材料，包括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還有渥茲渥茲的〈水仙〉、〈兩條小路〉、和一兩首英譯德文詩。我在大學時並非主修英文，因此程度平平，對那些經典英詩中語句的靈活奧妙，可說只是一知半解。但是蘇先生卻不厭其煩、竭盡其能地講解，以使初學者產生一些概念。雖然我仍是聽者邈邈，而且進步有限，然而我從其中卻深深感受到他誠懇敬業與誨人不倦的精神。對於他的教誨，我銘感於心，但卻愧於無法回報。

三、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經由那先生的推薦與江先生的同意後，蔣院長便將我調到書畫處工作。當時的書畫處位在舊館一樓

大廳的右側。江兆申先生擔任處長，下面分設三個辦公室：庫藏股、檔案股、與編目股。庫藏股的股長為張德恒先生，組員有張麗芳女士和沈鏗先生（離職後由王耀庭先生接任）。檔案股的股長為張光賓先生，組員有鄭瑤錫女士和夏雅莉女士（其前為宋后楣女士；夏離職後由何傳馨先生接任）。編目股的辦公室因兼作看畫室之故，所以面積較大，而且也因工作項目繁多，性質各異，所以人員也較多：當時的股長為林柏亭（圖五）先生，組員則有胡賽蘭和蘇瑞屏兩位女士，加上我和稍後進來的學妹顏娟英女士（離職後由朱惠良女士接任）一共六人。除此之外，還有兩個美國堪薩斯大學中國藝術史博士候選人作為英譯人員：Robert Thorp和Karen Brock夫婦（後由Robert Mowry, Kurt Brezendine, 和Claudia Brown接任）；後來孫先生和蘇先生也先後從資料室調到這裡。可說我們的大辦公室是全故宮最為忙碌的地方，但就

我而言，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了。

當時的書畫處是許多人想進去的單位。能進入書畫處工作是我莫大的幸運。江先生是我的老師，他認為到了博物館工作，不能只想要作研究，事實上許多的知識都是從實際的工作經驗中學到的。因此，他對工作要求也特別嚴格。我更是戰戰兢兢，不敢稍有鬆懈。進入書畫處的第一件

工作是為出版《顏真卿祭侄季明稿》的複製品寫研究說明。那時故宮所賣的典藏複製品是十分珍貴的，深受遊客所愛，也是出國送禮的上選。我利用大約兩週的時間收集一些基本資料，以簡單的文言撰寫。江先生稍加修改後，便轉呈蔣院長，並蒙院長謄獎，此事可算圓滿交差。江先生恐我因此起驕心，便特意於事後

以不經意的語氣警誡我切莫驕傲。我本無此意，當然謹然受教。現在回頭再看三十年前的那一篇說明，覺得當時仍囿於資料和所學，因此只側重整理文獻，而少作書法風格的分析與論述。而現在身為人師，也更能體會當年江先生隨時隨地提醒學生注意修持的用心。

顏娟英女士在研究所時代比我小兩屆，是我的學妹。但是她積極進取、動作敏捷，所以兩年便從研究所畢業，我又先在資料室待了一年，所以那時她便與我同年進書畫處。我與她也有許多共同的工作，特別是編目。每天早上我們一同遵照《故宮書畫錄》（一九六五）的體例，編寫它第八卷的〈簡目〉部分，為每件書畫作品登錄詳細的內容資料。加上後來故宮為出版《故宮歷代法書全集》（共三十冊），我們兩人便負責這部分的工作，一共做了二十四本。我們做的是法書作者小傳、釋文（內容辨讀）、及印章辨識等工作。草書辨識雖常令

圖六 書畫處同仁在老樹下合影，一九七七。

左前：胡費蘭、陳保真、畢惠良
左後：顏娟英、王耀庭、毛瑞、林柏亭





圖五 林柏亭為作者畫《速寫小像》(1975)及《生日禮物》(1977)

我們傷透腦筋，但從困惑猜測中最後摸索找出答案、豁然開朗時的樂趣，卻是難以形容的。由於編目和出版都是不能有誤的，所以我們工作時極為小心，也力求精確。如果真的難以辨讀，我們便去請江先生幫助。而每當下午較空閒時江先生也會特別允許我們由庫房提出一件作品，通常是冊頁，讓我們仔細觀察研究。這對於我們看畫的眼力是最好的訓練。這些實際工作的經驗，無形中提升了我日後對書畫作品的鑑賞能力。而這一切完全要感謝江先生給予我們如此難得的機會。

關於江先生的才情以及他對學生和同仁的愛護情形，我已在其他幾篇文章中說過，在此不再贅述。

我們努力不放棄珍貴的看畫機會。當時由於中國大陸對外關閉，因此台北故宮便成爲國外研究中國藝術史學者所能尋求資料最豐富的寶藏。故宮方面爲了保護文物，通常對提畫研究多加設限，因此看畫機會更屬難得。記

得那些年裡來過故宮看畫的學者包括美國的方聞、何惠鑑、艾瑞慈 (Richard Edwards)、羅覃 (Thomas Lawton)、周汝式等教授，和日本鈴木敬教授帶領研究生團隊、以及美國研究生李慧聞女士和江文葦先生等人。而每當有人提畫研究時，我們也盡量利用機會仔細讀畫並作筆記。提畫工作由張德恒先生和胡賽蘭女士負責執行，而由助理牛性群 (一九一八—二〇〇五，大家習慣暱稱他爲「老牛」) 和林炳陽兩位先生提件。老牛是河南人，早在抗戰時期故宮在四川時就已「入宮」了，因此可說是在故宮服務年資最久的老將了。他的個性溫和，耐性又好。常常看到他和林炳陽不慌不忙地拿畫、收畫。他們平日兼做各種勞役，沒有一絲怨言，有時還和我們開玩笑，有如家人，令人覺得溫馨。至今有時我去故宮，偶而還會碰到他站在台階上，一手擋著陽光，一面笑著和我打招呼：「陳小姐啊，你來了！」臉上還是從前那副

寬和的笑容，真讓人覺得親切。他自從十六、七歲進入故宮後一直堅守崗位，到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算算他與故宮的因緣已經六十多年了吧！真是難得啊！

除了趁外來研究人員提畫時看到真蹟外，我們與作品接近的另外一個機會便是換展的時候。那也是十分有趣的工作。大抵而言，每期作品展覽都限定三個月，而每當大規模換展時，全處同仁都加班，一起將舊展品收下，再將新展品擺上。最令人戰戰兢兢的是換大廳巨幅作品的時候了。因畫幅太高大，不能用畫鉤掛上，因此，只能先在畫櫃內上方釘好橫桿，下方釘滑輪，將繩子一端在下方固定後，將另端繞過滑輪以及上方的橫桿後，下垂備用。運用這種設備來掛畫的過程是：首先解開畫軸的綁帶，將下垂繩子的一端綁住畫軸天枰上的掛繩，同時用左手托住軸底，然後用右手輕拉滑輪上的繩子，像升旗一般，以兩手輕輕收放的動作使一幅畫緩緩上升展

開。當畫面完全展開後再將繩子綁好固定。如果是窄幅畫，一個人的左右手在收放時可以自相接濟，但大幅畫則必兩人合作才可以完成。而當展覽櫃不夠高而巨幅畫太長時，它的上部裱絹（紙）必需翻身繞過櫃內上方的掛桿，才能展現出畫心。每遇此時，會令人緊張到全身冒汗，因為一不小心，可能使老舊易碎的裱絹部分破裂。要等到全部過程順利完成、平安無事後，才能使人放心而鬆一口氣。

當然在換展前，我們必須先準備好新展品的展覽說明。寫好了簡短的中文展覽說明，經江先生同意後，便由辦公室裡的外國同事譯成英文。那時故宮秘書室及三大處（書畫、器物、圖書文獻等處）都有一些日文和英文的翻譯專員，幫忙處理相關的文書和出版翻譯工作，包括《故宮季刊》的英文摘要，《故宮英文雙月刊》和《英文展覽通訊》，以及各種定期展覽說明、和特展的圖錄內容等等，可說工作相當忙

碌。但對於來台學中文的外國研究生而言，這倒是最好的實習經驗了！

那陣子書畫處在江先生的領導之下，連續辦了三個相當重要的研究主題特展，且出版了具有學術性的展覽圖錄，包括：江先生的《吳派畫九十年展》（一九七五）、張光賓先生的《元四大家》（一九七五）、和胡賽蘭女士的《晚期變形主義畫家作品展》（一九七七）。這種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主題特展方式，正是當時美國博物館界與大學學者合作，結合兩方人才與資源，以提昇藝術史研究水準的主流趨勢。在這一點上，當時故宮書畫處可說已與世界先進的藝術史研究同步發展。而這樣的展覽模式在日後也持續主導了書畫處許多的特展。關於江先生在美國藝術史研究方面的貢獻，我在其他文中已略敘述，在此不多贅言。

四、

再說那些外籍的翻譯人士，



圖七 江兆申先生正在作畫（1977）

多半是國外在大學中修讀中文或中國美術史的博士研究生。他們特別趁來臺灣學習中文的機會，在故宮順便多看文物，當作是博物館實習。而在故宮作翻譯員正可收這兩方面的實效。在工作一兩年後，他們多半回國去完成博士學位，或正式工作。當時我的室友之一便是來自九州的內倉洋子女士，她在文獻處做翻譯工作。而上述我們書畫處的幾位翻譯員，由於與我們年紀相仿，

且專業相同，因此大家相處十分愉快，特別是Robert Mowry（毛瑞，現為哈佛大學沙可樂美術館東方部主任）、Claudia Brown（江韻詩，現為鳳凰城美術館東方部主任）和Kurt Brezendine（畢惠良，曾在賓州史瓦斯摩爾大學任教）等人。我們不但一同工作學習，交換不同知識，而且也常玩在一起，可以說其樂融融。（圖六）

那些年在書畫處的生活是很快樂的，同仁也都能和樂相處，互相合作，很少爭執。江先生對我們這些同仁和學生的照顧也十分盡心。他常到我們辦公室來，有時妙語如珠，大家十分開心。有時他一高興，也會在抽屜裡翻出些舊作來分送我們，偶而也會在下午時找大家一起喝茶，並說些他如何作印泥和修補善本書等事。那時週六上午還上班。常常快到中午下班前，常聽他跟老牛說：「老牛啊！下午畫畫喔！」於是，我也留下來，下午趁機看他如何作畫了！（圖七）

他對老牛是當家人照顧的。有一次老牛胃出血，江先生為他託人在榮總找到了病床，並帶我們幾個同事去探病。老牛屆齡該退休時，江先生又特別為他申請延退。

一九七八年七月，我依依不捨地離開書畫處，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從方聞教授修中國美術史博士班課程，畢業後也在那裡的大學美術館和東方藝術資料室工作了一段時間。在美國的十二多年間我常和江先生保持聯繫，尤其是剛去的前幾年，常向他報告我的生活趣事與學習經驗。據說江先生從來不給學生回信的。但一九八一年五月，我突然收到賽蘭姐的一封信，其中夾著江先生的親筆書（圖八）。信中講到他自己年輕時在山上尋野筍碰到烏梢蛇的趣事。我蒙受江先生的教誨與照顧實在太多了，而今他雖已仙逝九載，但記憶中那些充滿人情味的往事依然令人動容。

舊日的那一段故宮生活實在是我不人生當中一段十分特別的經

葆真：有在小蛇和毛、出姓的角上，回你第一封信。
樹上的青蟲，不知不覺，弄到我的頸子裏去。年
青時在江南常有此經驗。有時去山上尋野筍，
四五尺長的信筒蛇從我身邊過，咬而過，蛇在
腿起來，還毛髮竦然，想不到在著大的校園
裏也有此奇境。

老里夫南的討論會，我已經在年初時正式暫行
給何應澄通知不去了。將來我也沒有打算再遊
新陸。現在我祇想早點退休下來，能過幾年屬於
自己的清苦生活。

提起明清硬木傢具，我最迫倒買了幾件，言出是
晚清。最得意的是一張白楠木供桌，牠的製作年代
是一百三十年以前。保存得很好，沒有一點傷痕。
桌棧起深、棹頭、桌腿上的透雕，在今天看起來
的確够使人興奮的。

學校中功課忙，在想像之中。好！支持下去吧。多
學一點東西是不會吃虧的，而時間在因循中過去
或辛苦中過去，在你休息過來時，是大大分別。
江兆申先生
一九八一年六月

圖八 江兆申先生信札（1981）

歷。對我而言，那是一個處處充滿溫暖的地方。除了以上所說的蘇先生和江先生以外，我還受到許多師長的照顧，其中令我十分感謝的還有索予明、邱景任、吳鳳培、和林豐松等四位先生。

邱先生是我的裱畫老師。他早年在天津從名師學裱畫，來台後在台中進入故宮裱畫室工作，後來也到日本觀摩研究一年。邱先生為人十分謙和，當時從他學習裱畫的也有一些外國學生，記得其中有一位名叫司徒鎮漢。宋宇女士和我向他央求了好幾次，他才收我們為學徒。我記得上課的時間是每隔週的週六下午在他家中實際操作。最初，我們先拿自己在故宮購買的複製品練習，後來才裱真品。訓練的過程是先試立軸、再手卷、後冊頁、最後還做印章盒子。立軸是基礎，我們先學裁紙、托背、上板、收邊、鑲邊、加軸頭、牙子、貼籤條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其次再作手卷。手卷太長較麻煩，先把紙裁直已不容易，又得分段托裱上

板待乾，手續較煩。後來又做冊頁。如此讓我們熟悉各種書畫形制的形成。最後還教我們如何做裝印章的錦盒。我雖盡力如法炮製，但是無奈我做的印盒邊緣總是凹凸不平，怎麼關也有縫隙，難以密合。這可見我手藝是如何高明了。而邱先生看我那樣笨拙，也只好無奈而寬容地笑著。裱畫的秘訣除了手工和耐心之外，作漿糊更是真功夫。因此，邱先生又特別示範如何洗麵粉，那是製糊前奏的工作。他也曾在準備洗古畫和補古畫時，特別叫我過去看，以明白古畫修護的一些過程。我一直很感激他明知我手藝不佳，而且又不以裱褙為專業，但仍毫不保留地傳授秘訣。更令我感動的是，在我出國前夕，他送我一本科自裱好的冊頁，前面親用手毛筆寫了一些勉勵的話。我真的十分感動。邱先生那種長者的溫和敦厚令我感佩。邱先生在故宮一直主持修護書畫的工作。一九九一年我回來後還去拜訪過他。他退休後，由

林勝伴先生接任。而今林先生也退休了。故宮另招新人以持續這重要的工作。

五、

我對那幾年在故宮工作與生活上給我支持的師長與朋友充滿了感激。這些感覺很難用言語表達。正好，出版組組長賽蘭姐邀我寫一篇七〇年代的故宮，我便毫不遲疑地答應了。三十多年前的諸多往事漫無頭緒，卻鮮明如昔，令人印象深刻，歷久難忘；而今有些當日的師友或已別世，或已退休，更令人感念。如今提筆所記，雖不過糟粕，但畢竟是舊日情景。它不但是自己人生當中一段青春歲月，也是當時一些同事們共同的記憶，同時更是故宮在七〇年代的一方寫照。僅以此文向當日在多方面教導我、照顧我的師長和朋友們致謝。而且，更重要的是向故宮致敬。因為有它的存在，才吸引我們從各處到此，共度人生中的某一時段。那真是難得的緣會。而今故

宮又再度經歷一次新的擴建。且讓我們這些與故宮有緣的人祝福它光采煥然，產生新氣象，持續發揚更光輝的文化使命。

陳葆真謹誌

於臺灣大學 二〇〇五·六·四

（編者按：本文節錄自陳葆真原作，全文將於今年中旬集結成書）

作者其他相關文章——

1. 陳葆真，〈藝術史研究三十年感言〉，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網站 <http://cms.ntu.edu.tw/~artcv/>。
2. 陳葆真，〈懷念莊老師申慶先生〉，收於莊申遺著，《畫史觀微——莊申教授逝世三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歷史博物館，二〇三〇），頁四一—四五。
3. 陳葆真，〈廬山高——江兆申先生和他的藝術史學〉，收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編，《江兆申的藝術》（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一九九二），頁十七—三四。
4. 陳葆真，〈江兆申〉（台北：錦繡出版社，一九九六），中國一〇〇位巨匠叢書〇七八。
5. 陳葆真，〈滄海月明——懷念先師江兆申先生〉，收於《江兆申先生紀念集》（台北：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光吳氏基金會，一九九七），頁一五五—一六〇。